

中国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书籍装帧设计的视觉叙事机制研究

余佳成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200

DOI: 10.61369/TACS.2026050044

摘 要 :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与现代设计萌芽的关键时期, 书籍装帧设计作为视觉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这一阶段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范式转型。本文以视觉叙事机制为理论框架, 探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书籍装帧设计在视觉语言与物质载体等层面的叙事建构。

关 键 词 : 新文化运动; 书籍装帧设计; 视觉叙事

Research on the Visual Narrative Mechanism of Book Binding 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China

Yu Jiacheng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200

Abstract :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as a critical period for China's modern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and the germination of modern design. As a significant vehicle of visual culture, book design during this phase underwent a paradigmatic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This paper adop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visual narrative mechanisms to explore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book design in terms of visual language and material carrier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Keywords : new culture movement; book design; visual narrative

引言

新文化运动是对辛亥革命后政治乱象（如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以及深层社会问题的反思, 是中国20世纪初期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 它以提倡白话文为发端的新文化革命和创造, 使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 它也催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设计”萌发, 藉由生活的潜移默化, 开始了“现代设计”的历程。

这一时代背景下, 书籍装帧设计作为视觉文化与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 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传统线装书到现代平装书的范式革命, 不仅体现了技术材料和制作工艺的革新, 更折射出社会文化转型期视觉叙事机制的深刻演变。这一时期被视为“中国现代书籍设计的发轫时期”, 书籍装帧从单纯的书籍保护功能, 逐渐演变为传递新文化思想、表达现代美学理念的视觉叙事媒介。

一、时代语境——新文化运动与设计萌芽

（一）文化环境：批判与重建

打倒孔家店是这一时期最鲜明的文化旗帜。运动健将们（如陈独秀、鲁迅、胡适、李大钊等）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旧礼教是禁锢人性、阻碍中国进步的根源, 对其进行了猛烈批判。

文学革命方面, 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倡导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作为正式的文学语言。陈独秀紧随其后发表《文学革命论》, 主张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 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这使文学从士大夫的专属变为大众启蒙的工具。

同时, 在这一时期, 大量西方思潮被引入, 如自由主义、实

用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尼采、易卜生、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备受推崇。强调个人权利、自由恋爱、妇女解放（如批判贞节牌坊），呼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二）知识环境：转型与争鸣

文化环境的重建深刻影响了知识环境。在这一时期, 从“四书五经”到“赛先生”的转变标志着知识体系的核心从传统的经史子集转向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的思维方法（实证、理性）被奉为圭臬。

同时, 北京大学成为思想中心, 在蔡元培“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 北大汇集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兼课）、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派学者, 同时也保留了辜鸿铭等守旧学者, 形成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三）出版环境：繁荣与传播

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最核心的阵地。它首倡文学革命，引入马克思主义，几乎每一期都引发全国性的讨论。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报刊与书局林立，成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平台。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新兴书局接连涌现，积极出版新文化书籍和教科书，如《尝试集》（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女神》等。

（四）设计环境：现代性的萌芽

随着世界印刷技术的改进，欧洲文化和艺术价值导向也对当时中国书籍装帧的冲击非常大，书籍装帧艺术风格由单一转向多元。书籍装帧设计打破了传统线装书的样式，开始采用西式平装与精装。

由于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的推广，出现了字体与版式革新，报刊书籍的版式从竖排右起逐渐向横排左起过渡（尽管当时仍以竖排为主），排版更加清晰易读。

经济的逐渐发展使得商业美术开始兴起，在上海等大城市，月份牌、广告画等商业设计形式融合了中西方风格，反映了都市生活和现代消费文化的萌芽。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一时期的书籍装帧艺术才得以不断发展，成为中国现代书籍设计史的开端，也体现出了这一时期所特有的时代性。

二、主体实践——先驱者们的封面设计视觉叙事探索

封面是装帧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保护书页和传达书籍核心内容的功能。封面也是与其文本相呼应的书籍内容精髓的再现，是书籍设计中一个不可欠缺的重要部分。

（一）“民族性”的叙事：传统元素的创造性运用

鲁迅曾说过：“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灵魂——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即便历史的洪流不断向前推进，思想不断进步，西方文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性始终是不能舍弃的，所需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设计中也是这样，舍弃的应是传统中老套的设计形式，保留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并融入时代背景。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少设计师积极吸收现代主义、装饰艺术以及日本平面设计等多种流派的创作理念与表现手法，将中国传统的书法、水墨绘画与各类传统纹样巧妙融入封面设计之中。这种融合既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也彰显出他们对现代设计语言的独到理解。以陈之佛设计的《忏余集》（郁达夫著）封面为例，其作品将青铜器上的古典纹饰与现代几何图形有机结合，展现出借助现代设计方法将传统符号转化为适用于新兴传播媒介的视觉理念。

图1是曹辛之为《寥寥集》（沈钧儒著）所设计的封面。《寥寥集》是一部诗集，而诗歌是一种含蓄的艺术，所以曹辛志在这

本诗集的封面设计中突出了这种含蓄，其封面设计整体简洁别致，浅米色的底上隐隐能够看到写意的幽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幽兰被视为高洁、典雅、孤傲的象征；而写意是一种中国画的手法，通过简练放纵的笔触表现物象的意态神韵，强调内在精神实质。这种写意的形式使得设计显得洒脱而又不失法度，既高洁又端正，与上方规整的宋体字相互映照，设计简练而又含蓄，同时采用“花中君子”的兰花也是对作者沈钧儒君子之风的诠释与致敬。



图1

（二）“现代性”的叙事：西方潮流的本土实践

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变革，先驱者们试图在西方设计艺术与本土装帧传统之间，探索出一条真正契合时代需求的发展道路。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或“全盘中用”等极端主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所倡导的设计改良思想，为中国书籍封面设计者带来了新的灵感，也与当时学习西方文化的潮流不谋而合。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与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书籍封面设计革新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他对传统的书籍封面设计并不满意，曾指出：“过去所出的书，书面上或者找名人题字，或者采用铅字排印，这些都是老套。我想把它改一改，所以自己来设计。”在此基础上，鲁迅提出了“新思想要用新形式来包装”的设计理念，积极倡导学习西方艺术，主张借鉴当时西方流行的设计风格与手法，以增强封面的艺术表现力。通过不断学习与借鉴西方的文化与思想，鲁迅逐步构建并确立起自己的现代思想观念和专业审美准则。他广泛涉猎西方现代艺术与设计作品，曾“系统地介绍德国、苏俄等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艺术成果，从色彩、图案到线条、装订、排版各方面予以采用和吸收”，并成功将这些元素运用于书籍封面设计之中，从而推动中国书籍封面摆脱旧有样式，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钱君匋作为著名的出版家与书法家，他不仅对当时刚刚兴起的“西式开本”进行了实践性探索，其封面设计更常运用抽象的平面装饰图案与和谐的色彩对比，整体呈现出强烈的装饰韵味。他的这些设计实践，对当时的中国书籍装帧设计起到了显著的推进作用，例如他为开明书店设计的《两条血痕》便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三）“象征性”的叙事：隐喻与思想的内在表达

“象征”所指的是一种用甲来表现乙的形式，是一种“以此

代彼”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手法，象征体的字面意义或物理属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背后所承载的深层、普遍的寓意。例如在谈论鸽子时，人们联想到和平，谈论十字架时想到的不是两根木头交叉的物体，而是它象征的基督教、救赎、信仰等意义。

在《九叶集》（图2）的封面设计中，曹辛之先生展现了他非凡的象征手法与精妙的巧思。这部诗集收录了九位进步诗人的作品，设计师的核心意象是一棵以半抽象笔法绘就的大树。只见它枝干粗壮，树冠丰茂，更有九片叶子翩然挺立，每一片的形状都独一无二。曹辛之正是以此树喻指九位诗人，向读者揭示：他们的诗歌之所以能生机勃勃、各具风格，正是因为他们将创作的根须深深地扎进了生活的土壤之中。



图2

三、物质载体——纸张媒介的视觉传递叙事

自古以来，作为造纸古国的中国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有着其不可取代的贡献。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用以书写和绘画，后来有了印刷术，文化信息的传递变得更加广泛。纸是传递文化的主要载体、信息传播的媒介视觉传递的平台，与人们的生活、学习、劳动和生产息息相关，是人类无法离开现实存在。不同类型的纸张不仅构成了书籍物质层面的“肉身”，同时也作为艺术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作家的审美意识或思想相互融合、发生质变，进而生成一种不可分割的精神骨架。

1920年代初期，随着英美日等国生产的道林纸和更先进的印刷技术传入中国，新文学著作的出版开始普遍采用道林纸作为行业标准。与此同时，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的图书出版业迅速崛起，这些技术进步与产业繁荣，在客观上为新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道林纸在彼时成为了新文学图书印刷的上等纸张。例如闻一多的《红烛》、郭沫若的《女神》以及鲁迅的《呐喊》就都采用了道林纸。

鲁迅向来对瓷青纸情有独钟，他的《域外小说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都采用了瓷青纸。瓷青纸是一种华丽的染色加工纸，这种纸张颜色如瓷器的青釉，新鲜时与宣德青花瓷相似，表面光滑有光泽，质地较为厚重，可分层揭开，且具有不易褪色的特点。通过色彩与质感，传递庄重的文化意象，自带历史沉淀感。在《桃色的云》的封面上，鲁迅特意选用进口的日本“雁皮纸”，使书籍获得了与众不同的感官特质。及至1933年底，他与郑振铎合力推出的《北平笈谱》更是匠心独具：书中融合了传统拱花技艺印制的笈纸和现代印刷纸张，通过两种材质肌理的直接对话，生动地隐喻并展现了新旧文化之间的深刻碰撞与创造性交融。

在这些设计作品中，纸张的色彩、质地与字体被艺术化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其审美意蕴和气质也与文本内容相互呼应、彼此阐释。在作者精神力量的灌注与再造之下，纸张在艺术层面获得了生命的永恒。

四、结语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书籍装帧设计，不仅是中国现代书籍设计的发轫，更是一场视觉叙事的深刻变革。在这一历史转型期中，书籍装帧从传统的功能性装帧，逐步发展为融合思想表达、美学追求与文化认同的综合性视觉文本。在文化批判与重建的背景下，设计师们通过对传统元素的创造性转化、西方现代语言的本土实践以及象征隐喻的精神表达，构建起具有民族气质与现代意识的视觉叙事体系。同时，纸张、字体、色彩等物质媒介的视觉化运用，进一步强化了书籍作为文化载体的叙事张力与审美价值。

这一时期的设计实践，不仅奠定了中国现代书籍装帧的基本范式，也为后续书籍视觉设计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方法论启示。其视觉叙事机制的形成，既是对时代精神的回应，也是设计语言自觉与成熟的标志。在今天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文化语境中，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时期书籍装帧的视觉叙事经验，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视觉传达理论体系与设计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 [1] 黄艳华. 思想启蒙与视觉革命：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现代书籍设计的范式转型研究（1915—1930）[J]. 设计艺术研究, 2025, 15(05): 120-125.
- [2] 张璟. 新文化运动时期代表性出版物设计整理与统计[J]. 上海工艺美术, 2025, (03): 45-47.
- [3] 刘一蓝. “美”的实在与超脱——新文化运动中的艺术、设计与美育[J]. 装饰, 2021, (07): 60-73.
- [4] 吕春风. 鲁迅书籍装帧设计中的传统与现代[J]. 鲁迅研究月刊, 2019, (07): 76-82.
- [5] 刘静. 鲁迅书籍封面设计的视觉特征研究[D]. 太原理工大学, 2017.
- [6] 陈凌. 新文化运动时期书籍封面设计的美学追求[J]. 大舞台, 2014, (10): 83-84.
- [7] 谢欣. 鲁迅书籍封面设计的启蒙叙事[J]. 装饰, 2013, (02): 109-111.
- [8] 周大鹏. 浅析民国时期视觉设计的风格与形成[J]. 艺术与设计(理论), 2011, 2(06): 51-53.
- [9] 顾德先.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书籍封面设计[J].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03, (04): 95-98.